

『为人生』文学阐释

二二
《呐喊》《彷徨》论

曹斌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人生”文学阐释——《呐喊》《彷徨》论 曹斌 著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7-224-05853-X

.为曹鲁迅小说—文学研究
. 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9176 号

“为人生”文学阐释
——《呐喊》《彷徨》论
曹斌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宝鸡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ISBN 7-224-05853-X Z·1089

定价: 14 .00 元

目 录

第一编 创作论

第一章 “为人生”文学的选择	1
第二章 “为人生”文学观的形成	17
第三章 “为人生”文学的特征	33

第二编 人物论

第一章 忧愤者人生的释读	47
第二章 中介者人生的释读	66
第三章 孤独者人生的释读	80
第四章 阿 Q 论	102
第五章 传统女性的人生释读	129
第六章 堕落的上流社会	140

第三编 技巧论

第一章 喜剧手法论	151
第二章 悲剧手法论	168
第三章 死亡意象审视	181
第四章 人名及称呼的审美透视	194

第五章 “ 辫子 ” 意象审美透视 204

第六章 数字的审美特征 219

第七章 风俗审美 233

第八章 艺术手法杂议 246

第一编

创作论

第一章 “为人生”文学的选择

—

鲁迅属于 20 世纪的伟大人物,但要说明他的伟大之处,我们不能不去考察他所成长的时代,考察他所面临的历史和现实的课题。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只能从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实业救国’和‘文化启蒙’说起。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文化从封闭保守的传统文化向开放的进取的现代文化转型的标志。

一向自命不凡的老大封建帝国在年轻的以资本为后盾的新型帝国面前显示了自己的腐朽和孱弱无能,让自我感觉总是很好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自己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后的五六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从求变物质文明到求变精神文明的心理过程,并由此瓦解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伦理道德的精神支柱,使人们产生了信仰危机并由此引发了中国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要转变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由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圣人、贤人精心编织起来的庞大精神体系,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中国近代的物质文明引进来看,最初的引进意图也不过是引进可以用来维护固有的中国文明的手段罢了,本意并不在

于促进“维新”和培养科学的观念。并且,对于大多数习惯于做官当老爷、长于治愚民百姓和内乱的清王朝的官吏们来说,他们一开始并不相信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威力,而是自信中国孔孟之道可以征服洋人,化干戈为玉帛。

有清代官吏王壬秋给皇上的《陈夷务疏》为证:

言御夷者皆欲认其文字,通其言语,得其情伪,知其山川阨塞君臣治乱之迹,及其国内虚实之由;其最善者取其军食以济我师,得其器械以为我用,今设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独以为无益……

夫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假令法国布尧舜之政,读周孔之书,分置师儒,佑我仁政,则诸群将束手坐观,望风赞叹,以为真圣人之国乎……若使中土赍六艺之文,陈先圣之书,入其国都,宣我木铎,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桀犬吠尧之义,明国无异政之礼,以为其主耳。

……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血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

其文读起来也不乏慷慨陈辞的情绪,议论国事也颇有羽扇纶巾的架式,但愚腐和无知也一望可知。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特别是清代腐儒的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自大心理,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这样的整体文化心理保守的条件下,提出“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就已经是十分大胆的主张了。在这种中西结合的思想指导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这 50 多年中,中国一方面在继续修筑伦理的长城,一方面又向西洋的物质文明屈服,以江南制造局编译声光电化书籍,创置海陆、轮船、铁路、矿业人才学校,兴办工厂实业,派出留学人员为标志,说明了中国的士大夫们中的开明人物已经意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性,认识到了中国的挨打,直接的原因是武器装备不如人。

这种认识,又随着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的战败而被强化。刘永福的战败,使朝中的文臣武将一改王壬秋般的蔑视洋枪洋炮的态度,转而成为武器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中国人只要有了先进的洋枪洋炮,就可以不怕洋人并打败洋人。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兵工时代”。连中国最早派出的留学生容纯甫当时都认为:对于教育当暂时束之高阁,而以发展机器厂为前提,因为就当时中国的时势而言,炮枪对于中国比其他物品更为重要。因此,“声光电化”成为当时的中心话语,连后来成为中国思想界启蒙先驱的康有为、梁启超当时也认为,只待中国船坚炮利,背城一战,即可富强。

但 1894 年 7 月—1895 年 3 月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却击破了中国人强兵富国的梦想。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海军、陆军,船也不能说不坚,炮不能说不利,然而,陆上战败,海上的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战败的结果,令国人震惊,也给唯武器论者以当头的棒喝。它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寻求改变挨打地位的途径。

新的思考,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面对军事上的失败和朝野的惶恐,康有为出现在思想的前沿阵地。他起草了一份反对与日本人议和的万言书,其中心内容是“拒和”“变法”。他认

为当时提出的将京都西迁、练兵等等都是“权宜应敌之谋”，“立国自强之策”的根本在于“变法”。他一方面主张发展中国的工业、商业，倡导成立合股的公司，发展生产，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康有为是广东人，广东开放早，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都经由此传入，康有为得风气之先，所以他能在甲午战败后很快看到问题的症结，并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一起致力于鼓吹“变法”。1895年，他在北京组织发动了“公车上书”之后，就组织成立了“强学会”，并在此后的几年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维新派”，宣传“托古改制”的政治理想，幻想在保留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实行政体改革，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一主张，在1898年4月到8月初的“百日维新”中也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并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初步的实践。

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改革计划与洋务派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仅承认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性，也承认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所以他们的“变法”主张中就包括了君主立宪、自由办报、倡导实业、精兵简政，开办京师大学堂，兴新学、废八股等等更具有开放性的东西，只是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仍森严壁垒，不表示任何改变的意向。但即就是这样，维新派的主张也因为要伤害到王公大臣们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保守势力的残酷镇压，维新运动以“六君子”身首异处，康、梁等人的仓皇出逃而画上了悲壮的句号。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二

思想家总是以他所处的时代提出的社会问题、思想文化问

题及社会现实提供给他各种思想资源为思考问题的基础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正是在面对列强不断侵略,中华民族的存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了解西方,认识西方,逐渐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提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立宪救国”、“文学救国”等主张的。

“百日维新”失败后,经历了又一次打击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和落后的政治体制,一方面从政治上继续寻找突破的办法;另一方面则把思考的触角伸向思想文化的层面,开始了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启蒙的关注。前者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两个不同的派别,后者则产生了晚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从此拉开了对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良的序幕。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不久,严复出版了他的译作《天演论》,介绍了赫胥黎以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为基础创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介绍给了中国思想界,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从小聪明,富有才华,喜欢写文章。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在马尾创办了船政附设的船政学堂,招收优秀人才,想为海军储备将官。由于他赞赏严复的文章,便把14岁的严复招入学堂学习英文、自然科学知识和船政技术。严复19岁毕业后,在舰上学习了几年。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他先在抱穆士德大学院学习,不久又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1879年回国,担任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1880年被李鸿章提拔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富有爱国思想,很想为国效力,但中法战争失败,使他对洋务派新政的幻想破灭;中日甲午之战失败,

促使他对清朝的体制产生改良的思想。1897年,他和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在舆论上与康、梁相呼应,倡导“变法”。1900年,为了躲避义和团运动,严复回到福建宣扬自由、平等学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参议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1915年,他参加筹安会,拥袁世凯称帝,后又拥护张勋复辟。

严复是学贯中西的近代著名的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称他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严复一生重视教育,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和文化教育思想,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上),亚当斯密的《原富》等。

严复在教育上提倡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并进,主张兴学救国和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甲午战争失败后,他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道德堕落,因此他提出要“教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健国民体质,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培养国民守信、奉公、爱国的品质。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近代思想界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著作。他把挽救民族危机的强烈爱国感情,融和到对赫胥黎著作的翻译中,对西学进行新的文化释读,以意译+按语的方式表达自己要阐释的思想意义,使“物竞天择”“自强保种”等话语成了最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引发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强国的自信力和对科学的向往。蔡元培、鲁迅等都从《天演论》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

参考资料见郭灿《严复与近代文化转型》,《深圳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与严复一同思考中国变革问题的,还有“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此时梁启超由政治改良而转向文学启蒙,为中国近代思想界开辟了新生面。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入康有为门下,学习四年,接受了康有为的整个改良思想。1895年与康有为等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7年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任教,积极鼓吹变法。1898年以六品官衔办京师大学堂,后辅助光绪皇帝实行维新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编辑《清议报》,后又编《新民丛报》,提出了“新民说”,开始重视文学艺术的宣传作用,重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此时的梁启超,与严复一样,在政治上都是属于保皇派一党,其政治主张都是“君主立宪”。这也是严复以后拥袁称帝、拥张复辟的根本原因,他们都反对革命派推翻帝制的主张,但在思想文化上,他们都取比较激进的态度。梁启超苦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支持,就产生了改良中国的语言文学,以此来广泛深入地宣传维新派变法主张的强烈意愿,并进行了积极的倡导和认真的实践,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语言文学的转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起到了预演的作用。

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突出成就在于他倡导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推崇诗歌制作上“我手写我口”的通俗化主张,创立了用于说理的“新文体”,推动了中国文体由古文向白话文的转变。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新文体”是一种报章议论文体,是接近口语的浅近的文言文,他吸收了大量的现代语汇,因此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

梁启超的最大文学功绩是推崇“新小说”。他在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就向中国旧小说提出挑战,主张“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官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勋未俗。为其补道,岂有量也!”

亡命日本后,他在为自己所翻译的日本作家柴四郎小说《佳人奇遇》作的序中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寄之小说。”因此,他主张“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竭力抬高小说的地位。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首倡“小说界革命”,并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创刊号上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把小说推举到文学的最“上乘”地位。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和文学界的积极响应,中国文学从近代的末期开始,小说才有了文学的“正宗”地位。

梁启超的思想虽然激进,但其基本的文化立场仍是传统的,他虽然也抨击旧习俗、旧观念,但始终没有冲破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藩篱。因此也就不可能实现从语言到内容、到形式的根本

变革,这就是他的时代局限。但他选择的以文学为启蒙的途径,以及他渴望中国变革富强的政治责任感和激情,却激发了他的时代中的一批年轻人,鲁迅正是他们中的一个。

三

1898年,就在“百日维新”失败,严复译作的《天演论》出版的这一年,鲁迅18岁。在维新风气日盛,又饱尝了科举制度带来的家破人亡的痛苦之后,鲁迅选择了学洋务的道路,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在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

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鲁迅放弃走科举之路而选学洋务,是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的,母亲为此伤心流泪,而他却是毅然决然地进了南京的水师学堂的机关科,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入水师学堂也并非没有阻力,在这里当监学的一位叔祖看到家族子弟不走科举之路,要列籍洋务,就不让他使用家谱上的名字注册,为他改名为“树人”,传统观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它从反面又证明了鲁迅背弃读书人应走的科举之路所承受的沉重的社会压力。此刻的鲁迅,由于祖父周介孚引发的“科考贿赂案”带来的家庭的灾难和痛苦,已在情感上决意与科举一刀两断,他已不像他的前辈严复那样,虽学洋务,但总对没

有参与科考获得功名而心存遗憾,千方百计要对此进行一些补救。严复长期在海军任职,清政府授予他副将军衔,他却不去就任,自己花钱捐了一个同知官,后被保举为道台,1911年,他当了海军协都统职务,又让授予他一个文科进士的功名,可见他对科举功名的认同感是十分强烈的。

但鲁迅却对“功名”,甚至学历等不去计较,表现了务实的品性。他在矿务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又放弃了矿务专业,选择了医学,并选择了一个在日本并不出名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术,准备以后治病救人,促进维新。与鲁迅同期在弘文学院普通科毕业的厉绥之回忆说:

在弘文学院学毕日语后,我们就准备选择继续深造……我接受(鲁迅)先生的意见,与他一同学医。先生同我说: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

惟其以大众为念,以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己任,鲁迅才不求虚名而求真知,放弃科举而学洋务,走了一条背离传统的路。

知识分子专业的选择,一方面体现着个人的学识根基,爱好兴趣;还体现着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鲁迅选择学医,从切近的目标看是因为自己父亲的被耽误了的病,而产生了治病救人的强烈愿望。少年时代因方药及寻找奇特的药引子而形成的被“骗”

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1961年9月15日《文汇报》。

的人生经验,决定了鲁迅学习科学的医术,以解除病人及其病人家人的痛苦的学医选择。在鲁迅那一代留学知识分子身上,职业的选择已经成为一种可能,教育的专业化,已经使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读书只是为了做官的传统之路,他们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职业,如当教授、医生、工程师、作家、编辑等等。但这种职业选择的多元化,对职业选择来说,就有了抱负大小、社会责任感强弱等区别。即使从事同一专业,也有为人己为国为民程度上的差异。

就鲁迅选择学医来说,除了博施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外,另一个目的就是促进“维新”:即推动科学的传播,促进国人观念的变革。鲁迅从翻译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看到,日本的维新发端于对西方医学的引进和学习。西方医学是与人有着直接关系的科学,它从生物学、生理学、化学等方面研究人体,科学地解释和治疗人的疾病,破除了长期以来传统医学笼罩在人的疾病诊疗上的迷信色彩,传播了科学知识。西方医学的科学性,正是维新派所想借助于传播文明的有效手段。在接受了进化论,又受到了新式教育的鲁迅看来,医学是实现人生切近目标和价值的最好的形式,它平时可以治病,战时可以报国,实践中又传播了科学,是一箭三雕的理想职业,于是他选定了仙台医学专科学校。

假如鲁迅沿着学医的这条路子走下来,中国可能就多了一个医术高明,颇有人道情怀的新式医生,而失却了一位思想界的权威,文学上的旗手。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样子。

但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适时地调整自己的人生航向,不断向更高的人生追求和理想迈进,鲁迅的“弃医从文”就是如此。正像他弃科举学洋务,弃